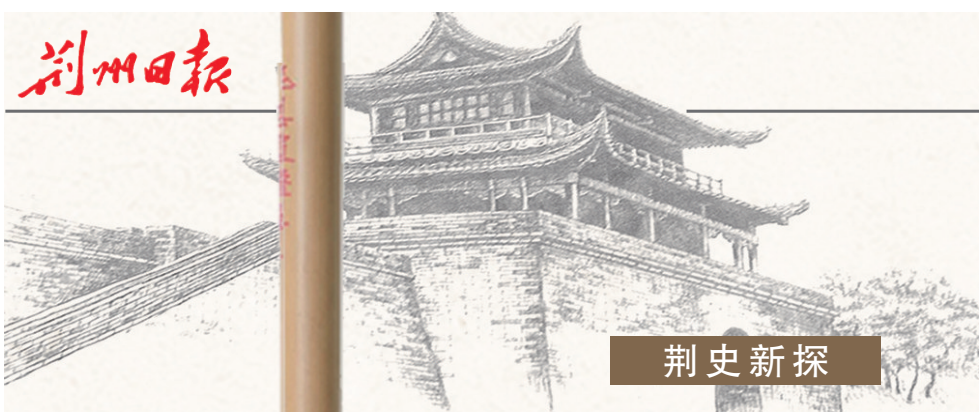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荆史新探

荆州,杜甫“诗圣”之名的起点

□ 袁枫

大历三年(768年)春,五十六岁的杜甫携家眷抵达荆州(时称江陵),欲在楚地暂避战火。彼时他已饱经离乱,贫病交加,诗作中“囊空恐羞涩”的窘迫,映照着生计的艰难。他在江陵城西寻得茅屋暂居,面对荆江云雨和藩镇割据的动荡,写下的诗句里藏着无依的怅惘。半年后,疫病蔓延、资财耗尽,杜甫不得不再次登船东下。离岸那日,江雾弥漫,他未料自己留在此地的诗篇,将被半个世纪后的另一位诗人重新拾起,铸就“诗圣”之名。

贬谪荆州后的困顿与觉醒

唐宪宗元和五年(810年),元稹踏着杜甫曾走过的江岸来到荆州。与杜甫的仓皇不同,他是以江陵府士曹参军的身份被贬至此——这官职形同“软流放”,无实权可言。

此前,元稹任监察御史时,因弹劾河南尹房式违法,又在驿站与宦官刘士元争厅冲突,触怒权贵,被贬千里之外的楚地。在荆州的五年(810—814年),成了他仕途的低谷,却意外成了创作的高峰。

他的办公地在荆州府衙西侧小院,每日处理工程营造、户籍登记等琐事。同僚因他被贬多敬而远之,政治失意让他将精力全投到诗中,《楚歌十首》里“楚人千万户,生死系时君”的句子,笔锋从早年艳情转向社会写实,添了楚地特有的苍凉。

这段日子,他的诗风彻底蜕变。早年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缠绵,转为“辞意意衰”的沉郁。《感梦》中写对长安的思念,却以“闲坐悲君亦自悲”的沉郁作结,个人际遇与地域特色在诗中交融,形成独有的“荆州范儿”。

在荆州,元稹的生活充满矛盾。他一面与白居易密切诗文唱和,隔空推动新乐府运动,写下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》,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;一面又因纳安氏为妾引发争议,与《遣悲怀》中“惟将终夜长开眼,报答平生未展眉”的深情形象形成反差,成了后世议论他“言行不一”的话柄。

他常参与当地文人雅集,席间吟诵新作。楚地巫风、楚辞遗韵渐渐渗入诗里。游纪南城遗址时,他见断壁残垣间野草疯长,写下“溟落贫甘守”“荒凉秽尽包”,既有对历史的感慨,也藏着对自身

境遇的喟叹。谁也未曾料到,这位困顿于江陵的贬客,将在三年后,为半个世纪前那位漂泊的诗人,写下改变中国诗歌史的篇章。

家族纽带下的共情与推崇

元稹与杜甫,本是相隔时空的灵魂。杜甫卒于770年,元稹生于779年,两人从未谋面。但命运的丝线,早已悄悄将他们连在一起。

这层纽带藏在家族亲缘里。杜甫的外祖母是唐太宗曾孙义阳王李琮之女,嫁入崔氏后生下杜甫之母;她的姐妹嫁入郑氏,生下了郑宏之母。而元稹的母亲郑氏,正是郑宏这一支的后人——算起来,元稹与杜甫算是远房亲戚。这层关系,让杜甫之孙杜嗣业的求助显得顺理成章。

元和八年(813年),杜嗣业背着祖父的遗骨,从湖南踏上北归之路。杜甫临终前遗愿归葬河南巩县祖茔,却因家贫暂厝岳阳。四十三年间,战乱不断,遗骨迟迟未能归乡。杜嗣业一路跋涉,遇过劫匪,遭过风浪,途经江陵时,听闻元稹在此任职。念及家族渊源,又知元稹在文坛的分量,他叩响了府衙的大门,恳请为祖父撰写墓志铭。

彼时元稹正因病卧床,听闻来意,挣扎着起身。他看着杜嗣业行囊里那卷泛黄的杜甫诗集,想起自己少年时读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震撼,想起自己各地所见的民生凋敝——这些与杜甫诗中的世界何其相似。他不仅慨然应允,还拿出俸禄资助杜嗣业完成迁葬。

在病榻前,元稹写下了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。这篇墓志铭,成了文学史上的里程碑。他在文中细数杜甫的诗歌成就,直言“诗人以来,未有如子美者”,甚至大胆断言李白的长诗“不能历其藩翰”。这番评价,既是对杜甫的推崇,更是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宣言。

元稹推崇杜甫,绝非一时兴起。个人境遇的共情至关重要。写墓志铭时,元稹正处于贬谪的低谷,政治失意,疾病缠身。杜甫一生困顿——安史之乱中被俘,流落蜀地,晚年漂泊无依——这样的经历,让同样身处逆境的元稹感同身受。他感叹杜甫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,何尝不是在写自己“各自埋幽恨,江流终宛然”的心境?此外,也是对诗坛话语权的

重构。中唐时期,诗坛仍笼罩在盛唐的余晖里,李白的浪漫主义被奉为主臬。元稹却通过墓志铭,将杜甫推为“集大成者”。“上薄风骚,下该沈宋,言夺苏李,气吞曹刘”,实则是在挑战既有审美传统,为现实主义诗风张目。

千年回响中的纷争与共识

元稹的墓志铭,像一块巨石投入诗坛,激起了千年涟漪。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革新。元稹与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,核心是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,而杜甫的诗,正是这一主张的完美实践。从“三吏三别”到《兵车行》,杜甫用诗歌记录时代,这种“以诗证史”的精神,与元稹的追求高度契合。他在墓志铭中特别强调杜甫“铺陈终始,排比声韵”的叙事技巧,其实是在为新乐府运动寻找历史依据。

最直接的是引发了“李杜优劣论”。他直言李白不及杜甫,白居易随即呼应,称李白诗“索其风雅比兴,十元一篇”。这一观点在当时便引发争议,有人批评元稹“拉踩”李白,有人觉得他夸大其词。但恰恰是这场争论,意外让“李杜”并称成为共识——从此,诗坛有了“浪漫”与“现实”两座高峰。

更重要的是,它让杜甫从“生前寂寞”走向“身后荣光”。杜甫在世时,诗作多散佚民间,知者寥寥。元稹以文坛领袖的身份为其“盖棺定论”后,韩愈、杜牧等名家纷纷响应,开始整理杜诗。到了宋代,苏轼称杜甫“古今诗人第一”,黄庭坚开创“江西诗派”更是以杜甫为宗法对象,终使“诗圣”之名由荆州星火,成为日月之辉。

元稹的评价,也深刻影响了诗歌创作的走向。他推崇的杜甫叙事技巧,被元白吸收,化作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的铺陈跌宕;他强调的“风雅比兴”,成了后世诗人关注现实的精神源泉。从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到陆游的“铁马冰河”,再到近代诗人的家国之思,都能看到杜甫的影子,而这一切的起点,或许正是元稹在荆州写下的那篇墓志铭。

如今,荆州的江风依旧吹拂,只是当年杜甫望雨的茅屋、元稹办公的府衙早已湮没在时光里。但那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学共振,却从未停歇——杜甫用苦难写成的诗,经元稹的慧眼发现,最终成为照亮中国诗歌史的不灭灯火。

楚史趣谈④

古代的士大夫,似乎政绩观念不算很浓郁,流连山水风流辗转者不少,袁宏道也算是个典型。他于万历二十年应进士第并进而开始其仕宦游历生涯后,从来没有耽误过山水游历、诗文酬答。

至于中郎是否到过武汉市新洲区之道观河,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,但是在他的散文中,曾用生动传神的性灵笔法描绘了“倒灌河”。在题为《识张幼于惠泉诗后》的文章中,中郎说了一段关于“倒灌河”水的趣事,读后令人“不觉绝倒”。“余友麻城邱长孺东游吴会,载惠山泉三十坛之团风。长孺先归,命仆辈担回。仆辈恶其重也,随倾于江。至倒灌河,始取山泉水盈之。长孺不知,诸重甚。次日,即邀城中诸好事尝水。诸好事如期而来,团坐斋中,甚有喜色。出尊取磁甌,盛少许,递相议,然后饮之,嗅玩经时,始细嚼咽下,喉中汨汨有声。乃相视而叹曰:‘美哉水也!非长孺高兴,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!’皆叹羨不置而去。半月后,诸仆相争,互发其私事……”至此,使用“倒灌河”泉水偷梁换柱以替代惠山名泉,真相大白。

麻城、团风是位于今天新洲周边的县市,“倒灌河”即现今之道观河。清光绪《黄冈县志》记载:“道观河,源自大崎山,西南流为高家河,折而北为倒灌河,即道观河(此地有紫霞寺道观因名)”。虽说当时诸好事者和名流喝的是道观河泉水,但看来根本无法辨识其与惠山名泉的高下。

如今,道观河已经是武汉市新洲区的重要旅游景点。道观河水仍然千古不倦地由东向西“倒行逆施”着,好山奇水自是令人流连忘返。而道观之泉水,吾知之者并不多。唯其西南保安寨森林公园景区竹木茂盛的山脚下,至今仍有一泓如镜,曰龙泉圣井,据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。行文至此,笔者斗胆一猜,当年邱长孺所喝的泉水,或取于此井哉?反正以我对于道观河的熟悉程度和踏访密度,除龙泉圣井之外,至今别无它踪。今天的游客不妨循道观河景区的保安寨拾级而上,至仰山寺前,即可找到此井。有时正当游人如获至宝诧异之际,仰山寺老衲多半会出声而出:“喝了我这个泉水呀,男的英俊,女的漂亮,细巧聪明,老人长寿。”说罢,游人争相品尝,行有余力者更是取水装瓶,恨不能更多搬运家中。这个泉水如此受人钟爱,或许实力不输于惠山名泉!

楚史趣谈

公元前690年,东征西讨的楚武王完成了历史使命,其子熊贲继位,楚国进入了文王时代(公元前689—675年)。

楚文王即位后采取的第一大战略行动就是把都城迁到了郢(今湖北江陵纪南城)。楚武王时楚国势力已深入到江汉腹地,所以楚文王即位后迁都到纪南城,实际上是对楚武王战略布局的承袭与发展。纪南城地处江汉平原腹地,兼有水陆之便,东接云梦,西扼巫巴,北连中原通衢,南临长江天险,不仅自然条件优越,而且战略地位重要,从此成为楚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可谓是“一子定乾坤”。

楚文王定都纪南城后,已稳控江汉。为实现他老爹当年念念不忘的“欲观中国之政”遗愿,立即全力北进。公元前688年,楚文王亲领兵攻申(河南南阳一带),随后在返楚途中,捎带着又打了一下他舅舅的邓国(湖北襄阳),将楚国势力深入到南阳盆地。

楚文王在北伐取得初步成果后,又图谋东向,以扩大北上的通道。公元前684年秋,出兵蔡国(河南上蔡县),在蔡国的莘(今河南汝南境内)大败蔡国,俘虏了蔡侯,接着又把他释放了。这件事轰动“世界”,一向被华夏诸国视为蛮夷小国的楚国,以这种霸道的面貌突然出现在中原的舞台上,让中原各国有些“晕菜”。公元前680年,楚文王又把息国灭了,还抢了息侯的媳妇“息夫人”,立为妃子,又再次长驱直入蔡国,占了人家的地盘。

公元前678年,文王一举灭掉邓、申两国,打通北上通道。同年,楚文王以郑厉公复位“没有及时通知楚国”为由,发兵讨伐郑国(今河南新郑),直抵栋(今河南禹县)而还。郑是姬姓国,又是春秋初期大国,楚文王竟说就打,足见此时实力已足以支撑楚国横行霸道了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说:“齐桓公始霸,楚亦始大。”楚文王和齐桓公几乎是同时步入春秋大国争霸的历史舞台。

经过楚武、文王两代不断奋战,“欲观中国之政”的愿望已经实现。楚文王的定都纪南与北进,为后来楚国北上争霸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文王会「武」开疆拓土

□ 老鱼



鸟瞰孟家溪镇三袁村

摄影 戴仲达 福建南安

文史杂谈

邲之战,楚庄王称霸的关键战役

□ 余大中

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典故虽载入史册,却未即时成就其霸业。真正让他跻身春秋霸主之列的,是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。这场战役不仅终结了晋国对北方的长期垄断,更彻底扭转了城濮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被动局面,使楚庄王成为继齐桓公、晋文公之后,又一位名副其实的霸主。

春秋争霸的关键,在于对中原腹地的掌控,而郑国因其地处晋楚之间的战略要冲,成为两国必争之地。城濮之战时,楚国西有秦国威胁、中有宋国叛离,故以服宋为首要目标;至邲之战前,局势已变:崤之战后秦晋反目,楚国解除西顾之忧,宋国亦诚心归附,唯有郑国受晋国胁迫,对楚叛服不定。对楚国而言,降服郑国便能封锁晋国南下通道,进而掌控中原——这便是邲之战爆发的深层动因。

从周匡王五年(前608年)到周定王九年(前598年),晋楚围绕郑国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拉锯:晋国四年内四度伐郑,迫其臣服;楚国八年间七次征郑,又使郑转而依附。其间爆发的北林、柳林、颍北三战,互有胜负,却始终未能打破僵局。郑国在夹缝中感叹“晋、楚无信,我焉得有

信”,最终采取“从于强令”的策略,这反而激化了晋楚矛盾,为邲之战埋下伏笔。

公元前597年,楚庄王再率大军围郑,晋国派荀林父率军救援,双方在郟地对峙。此时的郑国已不堪两国交替攻伐,决意“择胜者而从之”,暗中遣使赴晋营请战,刻意促成晋楚决战。

楚军则以谋略破局:先两度求和示弱,麻痹晋军;待晋军主将荀林父允应盟会、放松戒备时,又遣小股兵力袭扰诱战。恰在此时,晋将魏锜、赵旃违令攻楚,楚军顺势全线反击。晋军猝不及防,荀林父竟下令“先撤过河者有赏”,导致中下两军溃败,仅士会率领的上军因战前戒备得以保全。

邲之战的胜利,并非源于军力悬殊,而取决于双方指挥的优劣,这与城濮之战如出一辙。

楚军的胜利,在于楚庄王的集中统一指挥:战前多次侦查晋军虚实,以“示弱求和”麻痹对手;战时抓住晋军违令的战机,由局部冲突升级为全面反击,战术清晰果断。后世诟病楚军未乘胜追击,实则忽略了春秋“逐奔不远”“不穷不能”的军礼规范——这并非怯懦,而是当时

战争伦理的必然。

晋军的溃败,则源于内部混乱:主将荀林父优柔寡断,先是放弃“待楚军退而再击郑”的稳妥之策,强渡黄河陷入被动;后对魏锜、赵旃的违令行为毫无防备,遇袭后又以“先撤者有赏”的命令自乱阵脚。加之对秦军偷梁的顾虑,更束缚了决策,终致惨败。

邲之战的意义,远不止于一场战役的胜负。军事上,楚国通过此次战彻底降服郑国,封锁了晋国南下通道,将中原腹地纳入势力范围,终结了晋国的霸权垄断。政治上,楚国以胜利为基石,构建起以自身为核心的中原新秩序,迫使诸侯重新审视楚的地位。更深远的是文化层面:战后楚国的雅乐传入中原宫廷,服饰风尚为诸侯效仿,标志着这个曾被视为“蛮夷”的国家,真正成为中原文明的主导者之一。

这场战役证明:春秋争霸不仅是军力的较量,更是战略智慧与文化影响力的比拼。邲之战后,楚庄王“观兵于周疆”时的问鼎之问,终于有了实质支撑——他以一场决定性的胜利,完成了从“蛮夷之君”到中原霸主的蜕变,也为楚国在春秋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篇章。

二〇二五年第三十九期 总第一百七十一期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147

翰墨荆楚③

翰墨荆楚③

翰墨情深 金伯兴 书